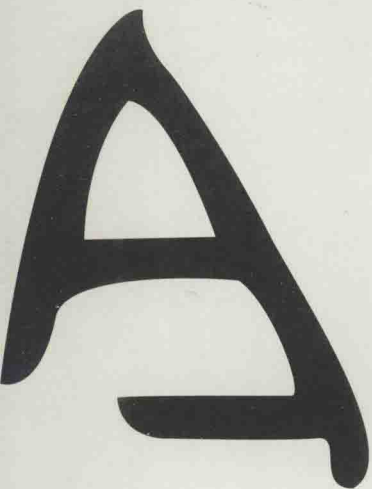




Novi Cives



过去与现在文丛
Past and Present

守先待后

思想、格局与传统

刘仲敬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守先待后

思想、格局与传统

刘仲敬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先待后: 思想、格局与传统 / 刘仲敬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0
(过去与现在文丛)
ISBN 978-7-5495-7113-0

I. ①守…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201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89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20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册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古老自由的源泉

信任和勇武构成一切政治德性的最初来源,在宗教和习俗的保护下积累文明的燃料。物满则溢,文明是德性积累越过阈值的产物。德性产生秩序生产力,秩序输出产生政治共同体。人类将复杂共同体生产、积累、汲取和燃烧德性的运作机制称为文明,将秩序的输出、输入、交融和冲突称为历史。文明为了释放更加美丽的烟花,自然会不断产生更加便利的德性开发技术。票据的技术如此出神入化,以至于持有者开始妄想代用券终将取代其代表的黄金。随着可兑换性的消失,最终的清算不可避免。烟花之后,唯有灰烬。末人的灰烬不同于蛮族的燃料,犹如开发不同于积累。

人类共同体大体沿着蛮族—希腊—罗马—埃及的顺序,从原始丰饶的黑暗回到原子末人的黑暗。文明在希腊(多国体系和各等级共治)和罗马(世界帝国和民主平等)之间,点燃的烟花最为璀璨。然而秩序的开发和消费超过生产和积累,也就是在这个季候。罗马秩序是文明叔季的最后正义,然而归根结底不过是挥霍封建自由及

其私性契约权利的积蓄而已。如果古老自由的生命力最终耗尽，埃及的萎靡就会接替罗马的伟大。埃及（吏治国家和散沙顺民）在文明的余烬中取暖，等待黑暗来临。

现代士大夫已经不能理解古老自由的真正源泉，一味陶醉于下游的浊水。他们将蛮族和埃及混为一谈，当做现代化的初等生；把季候差异视为制度差异，用妖妄的炼金术折磨万国与万民。历史理解力的衰退本身就是季候演化的产物，预示着熟极而敝的秋天。他们是秋季的摘果人，却不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只有播种者才需要理解古老自由的源泉，在甜蜜的果肉中保存坚硬的种子。

罗马不是为自身的荣耀而存在的，犹如果实并非为自身的甜蜜而存在，守先待后是她的命运（Destiny）。她遵奉冥冥之中的神意，在烟花最盛之际保存文明的种子，黑暗重返之前将种子撒向未来的蛮荒。灰烬的腐蚀性消弭之后，种子萌发的幼芽才会享有继承世界的机会。种子最清楚守先待后的意义，不会怀疑神明的智慧。

目 录

序 古老自由的源泉

I

003 大革命的终结

——从托克维尔、古参到傅勒

006 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中,天下乌鸦才会一般黑

014 天堂里的异乡人

——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

035 群氓时代的异乡人

——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与中国人的问题

043 政治经纪人的大众民主

047 明镜、天平与舞台:古老和年轻的正义

056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百川入海,殊途同归

——谁之现代? 谁之世界?

II

- 067 秦人信札
- 071 巫史文化的世界体系
- 075 想象中国,建构中国
- 077 华夏的世界主义与边界意识

III

- 087 纯粹的理念,混浊的经验
——政治哲学与历史的遭遇
- 096 义理的历史与考证的历史:卡尔·贝克尔的汉宋之争
- 105 文艺复兴人马基雅维利:史迹、史学与史观

IV

- 119 森林与封建
- 121 树大者根必深
- 123 威权主义与新威权主义

V

131 国会政治的童年

163 国会政治的青年

VI

235 共同体的主权与边界

——罗马德性与以色列使命的战争

249 基督的美国、罗马的美国、双面神林肯与恺撒主义的再起源

298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黑人问题

附录

311 逸民高士眼中的梵高

316 诗词选辑

大革命的终结

从托克维尔、古参到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1]是这样一种书：写作之日就准备成为思想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满足于讨论思想史。傅勒(Francois Furet)其人本来就是本·安德森(Ben Anderson)自许的“入戏观众”，先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给拉丁各国带来的赤色波涛而流入本国共产党，而后却在布达佩斯的苏联坦克身上发现了更为恣肆的面目，断然退党。这一回由他来宣称“终结雅各宾史学在学院的统治”，颇有象征意味。

大革命是二百年来一切革命之祖，现代的初期胚胎在这里成型，其两面特征首先在此表现。雅各宾专政，作者毫无怜悯地呼为“寡头政权”，做“前极权主义”分析，从而强调“立宪正统论”的思想

[1] [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系谱。如是,“热月是向代议制的复归,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的胜利”。

(认同或否认民主的)立宪论从西塞罗、博丹的伏脉起,在孟德斯鸠身上浮出水面,流过贡斯当、托克维尔、古参(Cochin),始终不过是“共和左派-反教权主义史观”大树下的野草闲花。风气大变,正如作者所述,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现在却到了附庸蔚为大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会证明历史必然性的虚妄,这就是了。本书的重点在思想史,对社会政治变迁不过择其大略。在思想史当中,托克维尔的地位跟其他人不可同日而语。古参只笼罩自家的一章,以哲人的社会学履步于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之上。泰勒(Taylor)和“物质史”诸家只起边角料作用。托克维尔却是无所不在的,甚至在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地方,字里行间也无不充满对他的答辩。

何谓自由?自由是隔离并缓冲政治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空间。侵夺、消灭这一空间就是全能国家的定义——向《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1]致敬。绝对主义断断续续地侵犯缓冲地带,干天下之怒而自亡。雅各宾党准备一举抹去政治与社会的界限,而社会通过热月,夺回了本来属于自己的位置。

何谓旧制度?古法兰西王权是民族的契约首领,一个明显的立宪正统论欧几里得公式,判然有别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神皇。王权不得直面其民,必须通过中间社团的调整制约。这些中间社团是各等

[1] [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级的法权代理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来自贵族。声名显赫的巴黎高等法院再三自任保民官,谋夺立法权。乱政出于双方的相互凌迫。

大革命是布尔乔亚取代没落贵族?否。贵族从未像大革命前二百年这样人才辈出,融汇了全国的精华。他们是商业革命的中锋,大革命后仍然如此。布尔乔亚是机会主义谋利者,而非革命者。他们首鼠两端,企图不付成本而取得大利。经济危机更不是理由,“太阳王”黷武时代才是经济衰退期,大革命前,经济繁荣,人口猛增,不亚于英国。三级会议面对的财政问题不过是税赋不公,是大繁荣中的小浪花。国民并非贫困潦倒,生活水准仍在上升。

贵族的各种模式:波兰式封建自由,贵族地方权力排斥官僚专权;普鲁士式贵族主导官僚系统;英国式模糊新贵族的立宪君主制。等级共识不存在。后事人所共知:“王国数废,帝国数亡,共和数易,行政官常在。”

旧制度何以灭亡?它并非保守,更非没落,反而是长期推行明达改革的政策核心,专制程度实不如后来者。它的问题在于,社会利害日趋分歧庞杂,国家吸收诱导机制失灵。“早至 1787 年,王政不复治国。”大革命在大革命之前就来临了。

若谓洛克字里行间充斥着 1688 年的气息,那么此书字里行间充斥的就是 1989 年的气息。漫长的二百年启蒙同短暂的 20 世纪在这年秋天谢幕。诸神的黄昏后,该当有人为提坦——雅各宾史学——收尸。然而,制造新神却不在谢幕者的任务当中。

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中，天下乌鸦才会一般黑

爱因斯坦曾经坦率地说，他执迷于大统一理论的动机不在功利，而在审美。也就是说，在简洁优美的理论照耀下，纷繁混乱的自然现象突然变得井井有条。人人都抗拒不了这种醍醐灌顶的幸福感。人文学者其实怀有同样的野心，希望各种零散知识之下存在某种深层次的统一规律。于是，他们不断犯下同一方向的错误，在根本没有联系的地方发现想象的规律，把大鲸和鲨鱼归为同类。相反方向的错误极其少见，因为谁都不愿意否定确定可靠的联系。可惜这种确定的联系实在太少，无法满足全世界学者共同的价值偏好。

20 世纪 60 年代是“现代化研究”的鼎盛时期，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半真空地带产生了许多著作。这场运动其实是冷战的间接产物。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想知道怎样才能顺利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他们希望能找到现代化的灵丹妙药，然后散发给不幸的第三世界人民，就像好心的美国大兵向柏林儿童发放糖果一样。更何况，这样一来，苏联人就会无计可施。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是这场运动的顶尖人物。他们跟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以两位“马克思(思)”(马克思·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工具箱为看家本领。

冷战结束后的思想氛围已经巨变,所以我们难以充分体谅 20 世纪 60 年代“现代化研究”的空疏和骄狂。很少有一门“学科”像这些学者一样,一开始就无法给自己的主要课题下定义。从来没有真正知道什么叫“现代社会”或“现代化”。大家只是模糊地觉得,二战后的美国应该算得上现代化的模范国家。既然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代的美国包括大众民主、工业化和社会保障的元素,“现代社会”大概也应该以此为标准。至于什么叫“传统社会”,连这样的参照系都没有。于是,顺化的儒生和山地的苗人、亚历山大的伊斯兰法官和丁卡^[1]的黑人巫师有幸分享同样的待遇。这种二分法的愚蠢程度相当于以下的做法:生物学家将物种分为“大象类”和“非象类”,后者同时包括鞭毛虫、渡渡鸟和长臂猿。

比较聪明的学者早已看出,鞭毛虫进化为大象的方式大概不会跟渡渡鸟相同,如果它们真有可能自发进化为大象的话。但即使在他们最夸张的想象中,可能的路径也不会超出两三条。《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2]为全人类的现代化勾画了三条路径:西方民主之路、东方共产主义之路和轴心

[1] Dinkas, 南苏丹白尼罗河流域的民族。

[2]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

国之路。这种划分法暴露了作者的时代和师承,只有二战结束后不久那一代人和深受 20 世纪 50 年代“新左”影响的那一批人才会这样预设框架。当然,这批人在打击韦伯-帕森斯学派的武断作风方面颇有贡献。后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假定,现代化和美国化没有实质性差别。直到今天,“新左”之所以见重于人,仍然是因为他们有纠偏补弊、拓宽视界的功能;技术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一向不是他们的特长。

同样,历史学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也不是巴林顿·摩尔的特长。一位科班的英国政治-社会史专家,首先用三十年时间熟悉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耕作制度,旁及英格兰东、南各郡,在退休之前,终于感到有把握将泰晤士河谷到赫尔海岸的庄田制度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如果有人询问约克郡、德文郡的土地制度,更不用说威尔士和苏格兰边区的,他一定会回答:从撒克逊时代至今,它们跟英格兰东、南各郡从来不在同一条路线上,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如果有人进一步要求他将印度纳入分类体系,他会有礼貌地回答:此事属于社会发展史的范畴。这话翻译成医生的语言,基本上等于:“患者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不过我碰巧认识一位老中医……”

《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以全世界农民的现代化为主题,因此理应非常依赖史料的准确性。不幸的是,本书中正确的史料屈指可数。相反,如果你把每一处错误记录下来,作出相应的解释,积累的读书笔记会超出原书篇幅的五倍以上。这样的著作居然能够在社会学界赢得(虽然只是曾经)一定的地位,本身就是通识教育失

败、党派精神肆虐的绝好证据。世界上没有比挑错和改错更无聊的活动了,然而在本书的范围内,指望“下河不湿脚”实在不切实际。

巴林顿·摩尔在最初两页内就将英国的民主归因于社会冲突和贸易增长,除谴责流行的神话以外,不觉得有必要提供额外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好无条件信任他的权威,否则篇幅就吃紧了。他接着用条状耕地代表全英格兰土地制度,把亨利八世没收修道院土地称为打击贵族,把英国革命的主力称为商品化进程的失败者,把圈地运动称为消灭自耕农的过程,甚至荒谬到把敞田制的没落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中国读者如果不太理解这些论述荒谬到什么程度,不妨想象一下某部中国史论著提出了以下的高论:王莽在科举失败后创立了太平天国,匈奴人的衰落为国民党的北伐创造了条件。逐一指出谬误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相反的做法比较简单。本书只有一项历史论述完全无可挑剔:革命前的英国王室没有强大的行政机构,基层权力掌握在乡绅手中。其他涉及历史的内容,读者都不宜信以为真。

针对这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乃至完全谬误的断语,巴林顿·摩尔只提出了一项解释:这样可以方便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予以对比。这样一来,本书就要沦为循环论证,因为此前和此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几种革命可以相提并论。这种提法本来应该是作者负责证明的假设,他却预先以假设为定理,反过来根据自己的假设筛选自己的材料。他试图以社会统计学支持历史论断,然而搜集的统计资料鲜有符合史料标准的。即使以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标准,他引用的史学著作都已经严重过时,何